

從羊城暴動到西子風波獄

喬家才

骨鯁于喉不吐不快

中外雜誌編者認為拙作「黃埔當年鐵與血」一文，意猶未盡，不能算是終篇，「應該還有更精彩的故事在後頭」，要我繼續再往下寫。誠然，北伐浪潮，空前壯大，無分軍事，政治與黨務，在我國歷史上都是自古迄今從未之聞的。一部北伐戰史，洋洋洒洒的寫了好幾十卷，百萬餘言。而在歷次戰役之後的政潮黨爭，內幕秘勿，又豈是我那一篇蕪雜短文所可以概其餘？何況，自我被革命的熱浪激起了壯志雄心，投筆從戎，離開家鄉，迢遙萬里奔向「黨旗飛舞，革命的黃埔」，一直到北伐完成，全國統一。這其間跟共黨奮鬥，和軍閥苦戰，我曾流過淚，坐過牢，受過最大的屈辱，經歷過好幾次生命的危險。實在是「我一生之中最值得紀念，最難以忘懷的一段時期」。果真要將當年往事一一記錄，那真不知道要浪費多少中外雜誌的寶貴篇幅。

然而，中外編者之囑却代表了中外讀者之請，而往事一經提起，歷歷如昨，箇中辛酸血淚，

豈祇「此情可待成追憶」而已，平心而論，坦白來說，在我也深有「骨鯁於喉，不吐不快」之感。人生難得遭逢當年如我的際遇，因而我便在想，倘以「行年六十，當知五十九年之非」的心情，心平氣和，就事論事，將私人的恩怨一概付之東流水。祇記我的親身經歷，見聞所及。為那一個亘古未有的北伐，留一鱗半爪真實紀錄，似乎也未為不可。因此，我奮然投袂而起，振筆再撰斯篇。

自我入伍，到離開黃埔，前後祇有一年又三個月。在這十五個月中間，北伐軍事變化異常劇烈。國民革命軍以雷霆萬鈞之勢，如秋風掃落葉，兵威所至，銳不可當。在洞庭湖南北，一舉擊潰吳佩孚的直軍主力，在閩浙皖贛，使東南大軍閥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兵敗如山倒，狼狽投奉張。北伐軍戰無不勝，攻無不克，連下長沙、武漢、南昌、福州、杭州、上海、南京諸名城。眼看北伐即將告成，中國就要統一。偏又有共產國際卵翼之下的中共陰謀竊奪政權，汪精衛覬覦領袖寶座，中了共黨奸計，甘以左派自居，終於演成

寧漢分裂，阻礙北伐貽誤統一大業。國民黨為鞏固黨的組織，保障革命的勝利成果，不得不實行清黨。接着由寧漢分裂而又有寧漢滬合作，總司令 蔣公下野，孫傳芳乘機偷渡長江，龍潭血戰，險乎使國家前途，兆民期望為之斷送。這真是我國歷史上極不尋常的一段時期。

我們這一部份黃埔軍校第六期同學，由廣東而杭州、而南京，整整經過三年才畢業。除去在廣東的十五個月，其他二十個月間，當然也有許多事情，值得敘述。而在黃埔那一段時期，也還有一些需要補充的地方。因此，這篇續篇其實也是在補前文之不足。

我雖非宿命論者，然而，對於俗諺所謂「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」之說，在年逾花甲以後，確是深信不疑。懷有此一種因結果，絲毫不爽的念頭，再回首自己過去的一切榮辱休戚，成敗利鈍，方始發現無一而非自己種因，然後自食其果的。因此，不論是多大的屈辱，多大的危難，撫今追昔，反省檢討，其結論每每是咎由自取，焉敢怨天尤人呢？這麼想時，果然就平心靜氣，心安

理得多了。我常想，也許這便是由於經驗、教訓而得來的收穫。

清黨以後的黃埔特別黨部，實際上由我們四個六期同學負責主持：一團五連劉誠之、十八連謝靈石、二團刁本卿，和我。黃埔特別黨部有兩萬多黨員，規模相當的大。北伐之前各級黨部常有被共黨及其同路人陰謀竊據把持利用，當做他們宣傳共產主義，發展組織，分化國民黨，杯葛國民黨忠實同志的工具。一派喧賓奪主，鵲巢鳩佔的惡劣作風，現在由我們國民黨同志自己主持了。不是很值得珍惜的嗎？我們四個人雖然經驗不夠，但總是盡力去做，很想把事情做好。

特別黨部的執監委員，如教授部主任張華輔先生，訓練部主任吳恩豫先生，官階都是少將，年齡也比我們大了許多。他們主持學校的教育和訓練，類似大學的教務長和訓導長，其權威却遠較大學教務長和訓導長為高，並且是學生們崇拜的對象。他們對於特別黨部的工作不大過問，祇是開會時，抽空出席而已。可是政治部主任鄧文儀先生，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先生，就跟他們迥然不同了。首先他們的責任是政治教育和思想訓練，主辦業務和特別黨部息息相關，其次，他們的年齡也和我們不相上下。青年人辦事比較認真，衝勁有餘，而歷練稍淺，這是青年人的長處，同時也是美中不足之點。就以部主任來說，當時是二十二歲，和我同年，都是丙年出生，屬馬。

上等兵訓令上校主任

鄧胡兩位都是上校主任，一位是一期同學，一位是二期同學。他們兩位官階相同，幹的又是同樣的工作，但是兩位主任的意見却時有參商，例如當特別黨部改選後不久，黃埔日報上發表了一篇劉姓同學的文章。劉同學是那一期，叫甚麼名字？已經記不清楚，官階好像是上尉，清黨時被關起來。文章不是他自己寫的，無從查考。不過文章的內容却是對於清黨表示不滿，又攻擊胡靖安和葉維。清黨是黨的決策，是黨的重大措施。因為清黨，國民黨的同志才掙脫由共產黨所生的革命障礙和羈絆，才挽救了國民黨的前途。即使清黨之舉在某些地方未能盡如人意，但也絕不是基於私人恩怨所可以否定的。黃埔日報是政治部在主編的校刊，怎可以發表反對清黨的論調，攻擊清黨最努力的同志呢？因此，特別黨部開會時，胡主任就這一件事情質問鄧主任。就事論事，我們四個人也認為黃埔日報刊登那篇文章有欠考慮。鄧主任當然也有他的理由，雙方相持不下，因而引起激辯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局面弄得非常尷尬。鄧主任一氣之下，就此不再出席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，事後使我們都深切的感到歉然。

另外還有一件事，政治部對特別黨部也有些不愉快，更加深了一層隔閡。有一天吃過晚飯，我一個人躍躍到俱樂部。俱樂部歸政治部管理，舞臺正對面的牆壁上，懸掛着一幅巨大的油畫，是梁鼎銘先生所繪的「沙基慘案」。確實的尺寸大小說不上來，祇記得這一幅畫非常的大，大概有一丈多高，三四丈長。畫中每一個人的神情表

現，遠遠望去栩栩如生，竟和真人一般。有的驚惶恐懼到萬分，有的眼淚一滴一滴往下淌，有的張着口，好像正在呼喊，有的被人擠得東倒西歪。還有被英帝國主義者的軍隊開槍打傷打死的人躺在地上，旁邊流着一灘灘的鮮血。但凡看到這幅油畫的，無不驚心動魄，同仇敵愾，對於英帝國主義者的凶橫殘暴引起深切的憎恨，由而讚嘆藝術的力量和價值，能够使人感動到甚麼程度？我對梁先生的這幅畫，喜愛極了，以前看過一次，但却因為過於匆忙，沒看清楚。這一天，想去仔細觀賞。無意中發覺汪精衛的照片和校長蔣公的玉照，一同掛在正面牆上。我覺得很奇怪，再去政治部所屬的其他機構看看，居然到處都是兩幀照片齊同並列。

清黨以前，汪精衛是黃埔軍校的黨代表（首任黨代表為廖仲凱先生），按照慣例，黨代表和校長的照片應該同時懸掛。可是寧漢分裂時期，汪精衛從國外回來，向蔣總司令的極力勸阻，用欺騙手段溜到武漢，甘為共產黨的傀儡，和南京政府公然尖銳對立。當時他已經成為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叛徒，國家民族的公敵，他的照片怎麼可以再懸掛呢？別的單位發生這種錯誤，還可以說他們的政治水準不够高，不知者不為罪，立予糾正也就罷了。但政治部是專門幹政治工作的，難道連這種起碼的常識都不知道？連敵友順逆都分不清楚？回到特別黨部，我把所見到的情形，告訴各同志。劉誠之兄首先表示不能置信，他反駁我說：「你開甚麼玩笑？政治部絕對不會錯誤到這種地步。照你這樣說法，他們還會把張作霖

和吳佩孚的照片也掛起來呢！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「別抬槓啦！」謝靈石兄插嘴進來，他是監察委員，對於這樣重大的事，他有責任。因此他建議的說：「咱們親自去看看，不就明白了嗎？」

說完，他們兩位一道出去，看個究竟。一會兒，誠之和靈石回來，氣忿不已，異口同聲地說：

「豈有此理，政治部居然會把叛逆的照片懸掛起來，太不像話啦！」

清黨已經兩三個月，而政治部還在懸掛汪精衛的照片，問題的確很嚴重。這種錯誤，可能是鄧主任疏忽，沒有注意到。也可能是政治部裏還潛伏得有共產黨，在暗地裏做手脚。因為政治部經過共黨長期盤據，很可能餘毒太深，鄧主任一時難於斬草除根。因此我們決議，由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一道訓令，命令他們立刻把所有汪精衛的照片摘下來，從今以後不得再把國民黨叛逆的照片和校長的照片並排懸掛在一起。第二天，我們再去政治部暨所屬各機構巡視，汪精衛的照片果然全不見了。我們對於政治部同仁的從善如流，頗表欣慰。

照說，黨權高於一切，政治部離開黨，還有甚麼立場？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訓令，糾正他們的重大錯誤，是合理、正確，同時也是必要的措施。不過見仁見智，各人的想法不盡相同。有些人居然認為我們這樣做，好像對鄧主任有點不客氣。因為政治部主任的官階是上校，主持特別黨部的則是四個上等兵。特別黨部給政治部下訓令

，又好像上等兵訓令上校主任。其實這個邏輯是不合理的。尤其當年我們都是二十幾歲的年青人，祇知道是非公道，不計較後果如何，自以為這樣做，才對得起黨，才對得起革命。流言蜚語，一概置之度外，不加理睬。

千鈞一髮逃出羊城

做共產黨的傀儡並不容易，汪精衛在武漢甘為虎俛幹不了多久，就幹不下去了，不得不也來個武漢清黨。不過他很會巧立名目，把「清黨」叫成「分共」罷了。汪精衛滿以為拿上武漢政府做資本，和南京合作，總可以討到一些便宜。不料武漢政府取消，南京新成立的特別委員會，對他厭惡已極，硬是敬鬼神而遠之，來個閉門不納，不歡迎他到南京去，於是汪精衛便成了武大郎攀槓子，兩頭够不着。一氣之下，爽性去做張發奎的尾巴，跟張發奎的部隊回廣州，進行反對南京特別委員會之舉。

清黨時逃之夭夭的第六期共黨同學，跑到武漢，都參加了張發奎的第四軍軍官團，此刻又跟着張發奎回來了。廣州市塵影幢幢，風聲鶴唳，情勢岌岌可危。許多國民黨的同志不敢再在廣州停留，紛紛離去。偏偏在這廣州面臨巨變，共黨劍拔弩張的危急情況之下，十六年十一月月上旬，黃埔軍校新任教育長李揚敬先生，又把我關進黃埔的禁閉室，使我失去了行動自由，每天坐處愁城，憂心如焚，不知道我在落入共黨之手後，將會面臨何種悲慘的命運？這時，校長 蔣公已經從日本回到上海，中央正籌備召開二屆四中全會

。我坐了三天兩夜的禁閉，好不容易用上聽汪精衛演講的藉口，被釋放出來。然後我立即逃離黃埔，前往廣州。

不到一個星期，「張黃事變」就爆發了。事變前一天，汪精衛偕李濟乘輪船離粵赴滬，出席四中全會。因此，在廣州的人們都說，這次事變是汪精衛有計劃導演的。他用調虎離山之計，把李濟調開，好讓張發奎和黃琪翔掀起大規模的流血事件。張黃所部不但繳了李濟梁公館衛士的槍，連北教場李濟梁的部隊也被繳械。同時他們佔領黃埔軍校，全力清除異己。假如我仍舊關在禁閉室裏，在佔領的當時，一定會被共黨份子所殺，那就不會活到今天。及今回思，猶有餘悸。

六期同學曾經受過共黨長期迫害，實在經不起他們再來一次反清黨。事變後第二天下午，劉誠之兄和我見了一次面，他和謝刁兩位已經不能再回黃埔，我們決定把特別黨部所存的七千多元現款，秘密發給同學，作為逃離廣州前往上海的旅費。錢雖不多，救急却很有效。當時，人心惶恐，躊躇徬徨，同學根本無人照顧，都在焦灼萬狀，走頭無路。可說是六期同學遭遇最黑暗的一段時期。在這個緊要關頭，特別黨部秘密發給他們一筆儘够逃離魔窟的錢，總算我們在暗中照顧大家，黨沒有拋棄同志，一定可以振作大家的精神，使他們不至於感覺淒涼無助，因而灰心失望。

我已經離開特別黨部，不能久留廣州，謝刁兩位也不願意經手發錢的事。秘密發錢，既有危

險，又很麻煩，隨時有被共黨捉去的可能，是一件喫力不討好的工作。劉誠之兄不避艱險，任勞任怨，一個人獨力挑起這付艱巨沉重的擔子，七千多元現款都由他一手發出，真是一項傑作，值得大書特書。

父親知道我到了黃埔以後，怕我沒有錢花，爲孔方兄所厄，曾經給我匯來一百元。但我入伍後，不愁穿，不愁吃，一切應用的東西，都由公家供給。除了偶然借二三同學，到廣州吃吃北方小館，解解嘴饞，很少用着錢。所以我身邊還存着六七十元現款。在同學當中，有這麼多現款就够得上是有錢階級了。山西籍的幾位同鄉同學清黨時都很努力，不敢留在黃埔，陸續續逃了出來，到廣州與我會合。我身邊存的錢足够我們幾個人到上海，用不着領特別黨部的旅費，我們隨時可以動身，不受時間限制。

當其時，東山的那個中央通訊社好像已經結束了，童秀明先生早已離開廣州，李貫英先生也不再住在東山，他搬到廣州一條小巷子的樓上居住。記得張靜齋、李冠三、王和衆、黃明性、邢淵經和河北的李耀東幾位同學聚集在李先生的寓所，向他借便衣。李先生立刻翻箱倒櫃，把所有的衣服全部搬了出來。除了自己身上穿的，都讓大家瓜分。他們把軍衣脫下來扔掉，穿上李先生的便裝，準備出走。李貫英先生的那份慷慨，那份愛護同志的熱情，四十多年來，每一憶及當時情景，都歷歷如在眼前。

胡靖安首建情報網

十一月下旬，我們到了南京。在上海、在南京、在滬寧車上，到處可以看見身穿軍服的青年軍人，這些青年軍人大多數是黃埔同學。他們沒有工作，暫時失業，僕僕風塵於京滬之間，投效北伐軍是他們的唯一願望。但是因爲我們的校長，蔣總司令爲促成寧漢合作，併力北伐和澈底清黨之三項願望，已經宣告下野，於是同學流離失所，許多同學幾乎連吃飯都成問題。這時候，大家深切地體會到革命領袖的重要性，失去革命領袖，將會是何等的悲慘。

因蔣總司令下野而造成的另一次大危機是孫傳芳趁機渡江，發動猛攻，幾使首都易手。龍潭血戰過後不久，滬寧車路過龍潭，滿目淒涼，還可以嗅到死屍的臭味。龍潭戰役中，四期同學和五期同學大部份擔任下級軍官（連排長），犧牲慘重。要不是這些同學付出生命的代價，消滅了孫傳芳渡過長江的部隊，我們還能在南京和上海的馬路上晃蕩嗎？假如沒有共黨陰謀竊奪政權，汪精衛不爲虎作倀，不見寧漢分裂，北伐軍分由平漢、津浦兩路北進，當年早就批亢搗虛，底定幽燕，完成了北伐大業，全國同胞生命財產的損失，不知將減却多少？眼見這徒使親痛仇快的血淚教訓，不由我們越發痛恨朝秦暮楚，視顏事仇的汪精衛。

十二月十一日，張發奎帶回廣州的共黨份子，和原來潛伏在當地的那些傢伙，來上了一次廣州大暴動。他們企圖佔領廣州，組織共產黨的蘇維埃政府。這次暴動屠殺了一兩千無辜的同胞，焚燬了半條廣州最繁華的永漢馬路，民房被燬者一

千數百間，財產損失五千餘萬。幸而李福林的第五軍及時趕到，才把暴動平息。這一次暴動也可說是張黃事變的延續，所以說張發奎和汪精衛都應當負廣州暴動的責任。

校長回到上海，住在法租界拉都路二十號。中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在上海召開。這一次會議非常重要，要解決許多迫切重大的問題。南京特別委員會搞的一塌糊塗，已經無法維持，國民政府必須趕緊改組。北伐軍停頓了好幾個月，要繼續北伐，就必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公復職，以副全國同胞的嚮望。我和劉誠之、謝靈石兩兄決定代表黃埔特別黨部向四中全會請願，請願書由我草擬。我們請求四中全會嚴懲汪精衛，要他擔負張黃事變和共黨廣州暴動的責任。當然，四中全會對我們的請願未必重視，也不會因爲我們請願果眞就將汪精衛繩之於法。不過，我們至少表達了黃埔軍校兩萬黨員的意向，因此，我們身爲黃埔特別黨部常務委員，也就心安理得，盡到我們應盡的責任了。代表中央出來接見我們的，是褚民誼。他代表四中全會接受了我們的請願書，向我們表示，一定會把我們的意見轉到。

我們同去請願的時候，無意中遇見胡靖安先生。原來他正擔任校長蔣公的侍從副官，也在拉都路二十號。我們總算是共過患難的同志，雖然因爲我的文章惹禍，把他入伍生政治部主任的差使鬧丟了，實際上他却因禍得福。他自己也在躊躇滿志的說：假如他不是廣州存身不住，來到上海，他就不會擔任現職。現在同學們要替

謁校長，必須先通過他這一關。看起來，比在廣州更加得意，益發顯得神氣。他看見我們安全到達上海，非常高興，問過我們廣州的情形，臨別時特地囑咐我第二天再去，他有話要跟我詳談。

胡靖安先生要我幫他一些忙，反正我閒着無事可做，當下立刻應允。他在法租界租好一間亭子間，給蔡勁軍和我兩個人居住，我們的伙食也由他替我們包好。蔡勁軍先生有兩套西裝，身上穿着一套，牆上掛着一套，經常覺得筆挺。他穿上西裝在街上走動起來，挺像個紳士。但他除去這兩套西裝之外，却連一隻皮箱都沒有。當然，他比我這個上等兵要強多了。我除了身上穿的一套藍帆布中山裝，可謂身無長物。

第二天胡先生規定我的工作，每天聯絡三個人，向他們要情報。三人之中有兩位是帶兵的團長，一位駐紮在閘北北站附近，名字叫張本清。張團長是黃埔一期同學，湖南人，英俊瀟灑，負責閘北方面的治安，供給閘北方面的情報。因為張團長和石仁成（入伍生一團四連）兄是好朋友，又知道我們兩人關係很好，所以對我格外親切。每次見面，告別時總要送出團部。另外一位團長駐在南市，也是一期同學，我們沒扯甚麼交情，有情報，他交給我，沒有呢，打一個招呼走路。由於我們不曾深談過，我對他的印象相當模糊，姓甚名誰，長像如何？早已記不清楚。祇記得關於南市方面的一切情況，全部由他負責。

戴雨農加入聲勢一振

還有一位，是戴雨農先生。他隨第六期騎兵

營由廣東開到蘇州，正趕上校長下野。於是他們這一營部隊，就此無人過問，沒人負責，連全營的伙食也沒有着落。營長沈振亞先生的太太眼看三百個學生吃飯都成了問題，忍痛把她的全部首飾拿出來，交給沈營長變賣，騎兵營的伙食才能維持下去。好些同學看到這種情形，於心不忍，便跑到上海自謀生活，戴雨農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戴先生對於上海的情形非常熟悉，胡靖安又需要上海的情報。他們兩位本來在清黨前後就打过交道，關係非常之好。現在胡靖安先生非借重他不可了，他負責租界方面的一切動態情形，因為校長住在法租界，這方面的情報就更顯得重要。每天他交給我的東西，厚厚一疊，要比兩位團長交給我的加在一起，還要多得多。當時我很奇怪，他的神通這麼廣大，用甚麼方法，從那裏找來這麼許多的情報的？彷彿全上海的大小各事，都非得經過他不可。

每天我由法租界跑到閘北，再由閘北跑到南市，最後才和戴先生碰頭。我們碰頭的地點沒有一定，每次見面，約定下一次的會晤地點，地點全部由他規定，有時在公共租界，有時在法租界。我的交通工具，除了電車，就靠兩條腿，整個上午都消耗在跑路上面。我把收到的情報帶回法租界寓所，交給蔡勁軍先生。下午，他坐下來整理這些材料，寫成報告，用胡靖安的名字，呈給校長。蔡勁軍先生真有一手，他寫報告，規規矩矩，一筆不苟，不塗改一個字，報告寫妥，有時由我送到拉都路二十號，有時他自己帶去。報

告送到，我們一天的工作就算了。

當時我不知道，這種工作就叫情報工作，也不懂得情報工作有多麼重要？我心裏想，幹這種工作和新聞記者大概差不多吧？因此實在提不起甚麼興趣來，連蔡勁軍寫好的報告，都沒有仔細的研究過。幹了一個多月，覺得像這樣拖下去，也不是個辦法。杭州已經成立了學生總隊，專門收容從廣東來的同學，我該歸隊了，免得將來升學發生問題。我把我的意見報告胡靖安先生，他略加考慮，表示贊成，於是十七年一月間，我去了杭州。

校長未復職以前，先在杭州成立學生總隊，收容由廣東北上的黃埔軍校第六、七兩期同學。總隊長賀衷寒，政治部主任鄧文儀。總隊下分三個大隊，由伍誠仁、宣鐵吾、陳明仁分任大隊長。我去杭州的前兩天，學生總隊的同學和傷兵發生衝突，幾乎釀成流血慘案。據說是傷兵在戲院鬧事，要砸戲院，同學們出面勸解阻止，不料傷兵不講道理，不但不聽勸告，反而把目標轉移到同學身上。別人害怕傷兵，惹他們不起，見面就躲避，我們同學却不怕。結果，雙方大打出手，釀成事端。總隊長賀君山先生據報非常生氣，認為學生和傷兵打架，很失面子了，氣到痛哭流涕，要捲鋪蓋不幹。然而前此同學們已經鬧過一次風潮，說校長發給同學們一批買書的錢，被政治部吞沒，一本書也沒有發下來，要算政治部的賬，也是鬧得不可開交。其實究竟校長發過錢沒有，政治部有沒有揩油，同學們從那裏得來的消息，誰也不知道。總隊當局為這兩件事傷透腦筋，想

辦幾個人，吓唬吓唬同學們，有以鎮壓騷張之氣。

我對杭州學生總隊的情形，一點也不瞭解，不知道曾經發生過前面所說的這兩件事。從上海到杭州，也不打聽清楚，懵裏懵懂就去報到，正好做了代罪的羔羊。報到不上一天，就被抓起來，送進憲兵營，同時被捕的，還有劉誠之和入伍生一團二連的彭章烈。沒頭沒腦，莫名其妙，三個人被捕下獄，誰也鬧不清自己犯了甚麼罪，該受何種懲處？所可認定的只有一點，那便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

莫明其妙的坐了牢

我們由學生變成囚犯，被監禁起來，喪失了自由，不過憲兵們對待我們却很客氣。起初我很奇怪，以後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原來傷兵早已成為杭州的一害，橫衝直撞，整天惹事生非。即使憲兵出面干涉，他們都照揍不誤。因為他們人多勢大，憲兵也惹他們不起，祇好遇事避開，免得喫眼前虧。想不到這批丘八兼丘九的學生總隊學生仔，居然膽敢打抱不平，不管你傷兵不傷兵，先揍了再說。經過這場打鬥，傷兵也有些駭怕了，氣焰一下子被壓了下去，替憲兵們解決了一件最頭痛的事情。所以，憲兵們對學生總隊殊深欽佩。他們曉得我們被關是爲了跟傷兵打架，誤把我們認做了揍傷兵的英雄，不但深切同情，而且十分敬重，處處給我們方便，從不以囚犯看待。我們白天可以在囚室裏自由活動，就是不能走出房門。夜裏分睡兩隻木籠，誠之獨佔其一

，我和彭章烈一籠同眠。籠子很狹窄，裝一人的籠子擠上兩人，連翻身都不方便，睡覺自然更不舒服。

同學們隨時可以上憲兵營探望我們，他們不時帶來一些吃食，有時帶幾個包子，有時帶幾隻粽子，憲兵不加干涉，也不檢查。我們雖然失去自由，變成了籠中囚，可是三個人關在一處，有說有笑，平時看看書，下下棋，倒也悠哉遊哉，並不寂寞。而且邢伯涵、張靜齋、王和衆、張子仁、吳毅安、李冠三幾位同學，每天下午輪班來看我，告訴我一些隊上和外面的消息。比起在黃埔坐禁閉，孤零零地，不知強過多少倍。

在杭州憲兵營關了一個月又五天，終於宣告開釋了。關得突然，放得也突然。從關到放，沒有人來審問過一次，總隊部和大隊部也從不派人來看我們，不明不白，窩囊到極點。有人告訴我：我們之獲釋，還是拜胡靖安之賜，多虧他替我們說話。否則，還不知道要關到甚麼時候為止。胡靖安先生當時紅得發紫，他說話當然有效。後來我看到他，他沒有問我被關起來的事，我也不會問他，我們是否由他搭救。

「我把你送到陸軍醫院，好好休養幾天！」釋放的當天下午，賀總隊長把我叫到樓上總隊長室，安慰我，對我這樣說。我們三個人同時被關，同時釋放，爲甚麼單獨對我優待，要送我往醫院呢？我想，大概是胡靖安先生特別關照過，賀總隊長才會對我這樣客氣吧？

然而，當時我却拒絕了他的一番美意，我直率的說：

「報告總隊長！我並沒有病，不需要住醫院。我所要知道的，祇是我究竟身犯何罪？爲甚麼要關我們一個月零五天？這一點，能否請總隊長見示？」

「軍人以服從爲天職，我要你去住醫院，你就去住好了，不要再問別的。」我看見總隊長跟我說話的時候，眼眶却含着淚珠，好像心裏非常難過，有一種說不出口來的苦衷。他既不能答覆我的問題，就祇好拿上「軍人以服從爲天職」來搪塞。當時我想：他同我無仇無怨，我們被關起來，當然不是他的主意，其中一定有一段隱情。他既然不便說明，是誰主張關我們的，我必欲追問，那豈不是徒然使他爲難嗎？於是我唯有應允接受他的好意，退出總隊長室，去住陸軍醫院。有些同學告訴我們，同學鬧風潮，鬧亂子，有人說是我們在幕後鼓動，想搗學生總隊的亂，想破壞學生總隊。果然如此，事態就很嚴重了，弄不好，來個軍法從事，還可能被殺頭呢。總隊當局雖然接受這種意見，但是又拿不出具體證據來，祇好糊裏糊塗的先把我們監禁，用以鎮壓其他同學。果然如此，那我們真是倒透了霉。一到杭州，就遭上了「莫須有」的風波獄。（待續）

請購存有永久價值的
中外雜誌合訂本